

汉语方言修辞学

汪如东摇著

学林出版社

序

摇摇汪如东的《汉语方言修辞学》即将由学林出版社出版,对汉语修辞学来说这是开启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因此是件很有意义的事。

摇摇在中国社会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变化,由于人群的迁移、扩展、相互接触等等原因,汉语逐渐地产生了分化,形成了分布在不同地域上的方言。不同的方言之间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差异,从而形成了不同的方言属区。不同历史时期的方言及其分区是并不相同的,从研究的角度则根据这种不同可对方言进行分区,以现代汉语方言分区来说,目前较为常见的就是七大方言的分区法,这七大方言为:官话方言(又称北方方言)区、吴方言区、湘方言区、赣方言区、客家方言区、粤方言区、闽方言区,^①在各大方言区内,根据其内部差异还可分成不同的方言片、小片、方言点。千百年来,正是这种种不同的方言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作为全民共同语的“辅助”工具在社会交际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使语言能很好地满足交际的需要。而在这种长期的过程中,实际上不同的方言在形成自己特有的以语音、词汇、语法为构成要素的语言体系的同时,也在语言的

^① 这里的有关现代汉语的方言分区的说法和其他某些观点主要参考《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卷许宝华、詹伯慧“汉语方言条”的看法。在该条目中,对现代汉语方言的分区的变化和分歧情况有着很详细的说明,请参阅。

运用上形成了具有方言特色的语言运用的特殊现象,即具有鲜明特点的方言修辞现象,这种方言修辞的现象同样也应该是方言研究的对象。

摇摇对方言的研究在我国古代很早就开始了,通常认为,汉代扬雄的《方言》(全名为《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是我国第一部方言词汇著作),是我国古代汉语方言的研究的开始,从《方言》至章炳麟的《新方言》,我国的古代汉语方言研究历经了两千多年的历史;而从“五四”至今,现代汉语方言学也经历了八十年左右的历程,我国的方言研究可谓历史悠久。综观我国的方言学研究,特别是从二十世纪上半叶现代方言学在我国建立以来,在方言的共时描写研究方面,以及历史和比较研究方面都取得了可观的成绩,其中特别是在方言语音系统的归纳分析上成绩尤为显著。但在看到方言研究的这些成绩的同时,我们也不能不注意到这样的一个事实:这些研究似乎都集中于方言语音、词汇以及方言语法等方面(如果换一种说法,也即是说,研究主要还是集中在语言的本体结构的研究上),而对方言的实际运用亦即方言修辞问题并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这不能不是一种缺憾。

摇摇其实,无论从方言和民族共同语的关系来看,还是从方言修辞同整个方言研究的关系来看,以及方言在社会交际中的实际作用来看,给方言修辞研究以应有的重视是必须并具有积极意义的。从语言学的一般常识来说,我们知道,实际上任何民族共同语的形成都是以一定的方言为基础的,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民族共同语总是通过不断地吸收方言中的具有表现力的成分来不断地丰富和充实自己的;至于方言的研究,在很多情况下必须联系于语言运用的实际才能做出客观的描写得出科

学的结论,这早已有众多的实际例子加以证明,而方言在人们的社会交际活动中的重要作用,特别是方言所起到的地域文化的传承和联系的纽带作用,可以说在一定的范围内,有时是共同语所无法替代的。正因为此,作为方言的研究给予方言运用问题亦即方言修辞以一席之地,对修辞学来说固然是研究领域的一种拓展,就是对于方言学研究本身来说其实是一种充实和完善。

摇摇对什么是方言修辞至今尚无一个确切的定义。我们认为,所谓方言修辞实际上就是以方言的语音、词汇、语法等材料 and 方言中特有的表现手段构成一定的修辞方式以达到特定修辞效果所进行的言语交际活动。方言作为民族语言的一种地域变体,本身有着自己的语音、词汇、语法系统。这些方言的语音、词汇、语法构成要素事实上都可以被用来作为方言修辞的材料和手段以形成特定的修辞方式,在交际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在现实的言语活动中,利用方言语音、词语、句式所具有的独特修辞色彩或方言词语所具有的独特表达功能来形成某种特殊的表达效果,以附有特有的地方方言色彩的方言词语和句式以营造作品的特有地方气息或作家的个人风格,等等,这些实际上都已经是方言修辞中常见的手法,也是方言修辞研究中被人关注的内容。近几年来,方言修辞问题已经逐渐受到关注,但从总的情况看,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数量很少,而且从内容看主要地还只是集中在有关方言词语修辞方面,涉及的面和内容比较狭窄,所以在方言修辞研究方面要真正有大的进展,无论在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上都需有进一步的开拓和深入的发掘。《汉语方言修辞学》的出版正是这种努力的一种体现,该书的出版其意义也正在于此。从内容上看,本书主要是集中在汉语方

言的语音差异对修辞的影响以及修辞手法的形成这一角度来研究方言修辞的。书中主要从不同方言的不同节律特征、连续变调、文白异读、语音构词、谐音关系等方面的差异性入手对语音手段的差异所给予修辞的影响问题作了规律性的揭示。因为是集中于对方言语音与修辞关系这一问题的探讨,因此论述也就显得比较系统、深入,具有一定的深度,在方言修辞研究的开始阶段,能有这样的成绩是十分难能可贵的。方言的语音差异是方言差异中最为明显的部分,而方言的语音差异所形成的方言修辞现象是方言修辞中具有代表性的部分,因此这一角度的研究在整个方言修辞研究中十分重要也是具有代表性意义的。当然,从另一角度看,这一研究很显然还并不是对方言修辞的全面的系统探讨和论述。但作者的这种探索精神,相信一定会给以后的研究以有益的启发。

摇摇是为序。

李熙宗

四五年 怨月 缘日

目摇摇录

序	李熙宗摇员
第一章摇汉语方言修辞学与传统汉语修辞学的关系	员
摇第一节摇传统汉语修辞学研究中的偏差与不足	员
摇第二节摇汉语方言修辞学的性质与学科地位	员
摇摇一、汉语方言修辞学的性质	员
摇摇二、汉语方言修辞学的学科地位	员
摇第三节摇汉语方言修辞学的研究范围与方法	员
第二章摇汉语方言的地域特色及与修辞的关系	员
摇第一节摇方言与文化的关系概述	员
摇摇一、方言是地域文化的外在标记和底层蕴涵	员
摇摇二、方言是文学语言的源头和生命	员
摇第二节摇汉语方言语音的主要差异	猿
摇摇一、汉语方言的南北之别	猿
摇摇二、现代汉语的方言区划	猿
摇摇三、现代汉语方言语音的主要差异	猿
摇摇摇(一) 声母方面	猿
摇摇摇(二) 韵母方面	猿

摇摇摇(三) 声调方面	猿
摇摇摇(四) 音变方面	源
摇摇摇 第三节 汉语方言与共同语的关系	源
摇摇摇 第四节 从入声看方言语音对修辞的影响	源
第三章 汉语方言的节律特征对修辞的影响	缘
摇摇 第一节 概述	缘
摇摇 第二节 汉语方言音节结构的类型差异	缘
摇摇一、音段音位和超音段音位	缘
摇摇二、汉语方言音节结构的不同特点	缘
摇摇三、音长与音步	远
摇摇 第三节 汉语方言节律构成的层次差异	远
摇摇一、音步节奏层上的韵律差异	远
摇摇摇(一) 关于双声叠韵	远
摇摇摇(二) 关于重叠	苑
摇摇摇 员 语法重叠和语用重叠的分别	苑
摇摇摇 圆 重叠的韵律特征影响语体及风格色彩的表达	苑
摇摇二、基本节奏层的节律差异	苑
摇摇三、语句层次上的韵律差异	愿
摇摇 第四节 汉语方言声韵律格式的表现差异	愿
摇摇 第五节 儿化和轻声——北京话口语的韵律特征	愿
摇摇一、方言中儿化韵的表义功能差异	愿
摇摇二、儿化韵的风格色彩差异	愿
摇摇三、儿化韵的表情功能在修辞中的运用	员
摇摇四、轻声在表义中的作用	员
摇摇五、方言中轻声的修辞差异	员

第四章 摇连读变调与文白异读在修辞中的作用	158
摇第一节 摇方言中连读变调在表义中的作用	158
摇第二节 摇连读变调与修辞表达的关系	160
摇摇一、语速的快慢影响表达	160
摇摇二、连读变调所反映的语体色彩差异	162
摇摇三、连读变调与谐音双关	168
摇第三节 摇文白异读的修辞功能	169
摇摇一、关于方言中的文白异读	169
摇摇二、文白异读的掩饰功能	178
摇摇三、文白异读的语体功能	180
第五章 摇汉语方言语音构词的修辞学分析	188
摇第一节 摇潜显理论在语音构词分析中的运用	188
摇第二节 摇汉语方言词向普通话过渡中的两种不同形式	
摇摇摇摇摇	198
摇第三节 摇音节在语音构词中的修辞作用	198
摇摇一、汉语方言双音化构词倾向的潜显差异	198
摇摇二、双音节词(四字格)与三音节词承载语言雅俗的 潜显差异	198
摇摇三、语词音节数目的趋简及组合中语音的修辞性选择	
摇摇摇摇摇	198
摇第四节 摇汉语方言吸收外来语词的潜显差异	198
摇摇一、外来词的吸收与地方语音特点的关系	198
摇摇二、外来语词吸收中的潜显差异与修辞的关系	198
摇摇三、汉语方言中的外来词所显示的语体风格差异 ...	198

摇第五节摇汉语方言中象声词的修辞理据分析	员愿
第六章摇汉语方言谐音修辞的研究	员圆
摇第一节摇概述	员圆
摇第二节摇汉语方言谐音形式的类型差异	员源
摇摇一、汉语方言谐音构成的语音基础差异	员源
摇摇二、从静动不同的角度对谐音音节的分析	员苑
摇摇摇(一)声、韵、调完全相同型	员苑
摇摇摇(二)声、韵相同而调不同型	员愿
摇摇摇(三)声、调相同而韵不同型	员愿
摇摇摇(四)通过连读或文白异读而形成谐音	员怨
摇第三节摇谐音在方言部分辞格形成中的作用	员员
摇摇一、谐音与析字	员员
摇摇二、谐音与顶真	员猿
摇摇三、谐音与藏词	员源
摇摇四、谐音与趣粘	员苑
摇第四节摇共同语在汉语方言谐音形成中的作用	员愿
第七章摇共同语和方言在语音互动中的修辞学原则	员圆
摇第一节摇方言性普通话在语言交际中的作用	员圆
摇第二节摇会话含义与语码转换	员源
摇第三节摇方言语码转换中的修辞学原则	员苑
摇摇一、语码转换的心理动机和语言环境之间的矛盾 ...	员愿
摇摇二、方言语码转换的趋近偏离和增距偏离的矛盾 ...	员猿
摇摇三、方言语码转换的顺应性和标记性原则的矛盾 ...	员苑
摇第四节摇方言腔调的修辞作用	圆园

参考文献 四

后记 四

第一章 摇汉语方言修辞学与 传统汉语修辞学的关系

第一节 摇传统汉语修辞学研究中的 偏差与不足

摇摇传统汉语修辞学的研究,从先秦典籍关于用词、风格方面零星的论述,到 20 世纪上半叶以陈望道《修辞学发凡》为标志的现代修辞学体系的建立,一直把雅言通语或汉民族共同语作为主要研究的对象。“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论语·述而》)“居官临民,必说官话,即雅言矣。”(刘宝楠《论语正义》)在古人的心目中音有楚夏,即有雅言与方言之别,并以雅言为正响,方言为讹韵。刘勰在《文心雕龙·声律》^①中论述得更详细,他把用韵分为两类,一类比作“吹箫”,是“无往而不壹”的,如曹植、潘岳之作;另一类比作“调瑟”,必须调弄才能取准,故“有时而乖贰”,如陆机与左思之作。他具体写道:“又诗人综韵,率多清切,《楚辞》辞楚,故讹韵实繁。及张华论韵,谓士衡多楚,《文赋》亦称知楚不易,可谓衍灵均之声余,失黄钟之正响也。”“士衡多楚”而杂用了方言,以方言入

^① 《文心雕龙解说》第 266 页 [梁]刘勰著,祖保泉解说,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4 年版。

韵,则“失黄钟之正响”。南宋杨佖《古今词话》有这么一段用韵的记载:“昔有人题词于吴江垂虹桥,不书姓名,或疑仙作,传入禁中。孝宗笑曰:‘以锁字押老字,则锁当音扫,乃闽音也。’访之,果系闽人林外所作。”可见,古对方言入韵十分敏感。而要避免方言入韵,则必须“翻回取均”,犹如移柱调弦,以求“正响”。选字押韵,要押得圆滑,应像圆形的物体,转动得随处适合,此音由于方言的关系而被选入韵,但读起来很不圆活,这恰像方柄插入方孔一样,转动不得,如果加以试验,使韵脚的字音能够免于柄方,那即是正韵了。这是古人对用字押韵最早的实践总结,也是对汉语语音修辞较早的系统性的论述。在语言运用上人们都愿意遵守零度形式,以民族共同语为准,以通俗易懂为佳,方言自古以来就被看作是不登大雅之堂、为人们所鄙弃的东西,或仅仅是共同语的一种点缀而已。

摇摇这种修辞理念后来一直被延续下来,并被近现代众多的修辞学家所自觉遵守,支配着理论的形成,并指导着修辞的实践;修辞上所说的内容,就是文章和说话的内容。修辞上所说的形式,就是文章和说话的形式”^①,文章和说话就是指汉民族共同语的书面语和口头语。王易在《修辞学通论》中提出修辞要“戒方言、戒俚语、戒古语、戒外国语”,一句话,就是要戒与共同语不一样的东西。这种修辞理念贯穿于汉语修辞学的一些基本理论和原则中,如关于修辞的定义,概括起来主要有“修饰说”、“加工说”、“选择说”、“准确鲜明生动说”、“经济简练说”、“适应题旨情境说”、“言语形式的适切组合说”、“美辞说”等八种。其中,持“调整说”、“适应说”、

① 陈望道《修辞学发凡》第 108 页,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版。

“美辞说”者甚众。陈望道在《修辞学发凡》中说：“修当调整或适用解。辞当作语辞解，修辞就是调整或适用语辞。”作者进一步解释说，这里所说的“语辞”，包括书面语言和口头语言。所谓“调整或适用”，指的是在“材料配置定妥之后，配置定妥和语辞定妥之间往往还有一个对于语辞力加调整、力求适用的过程；或是随笔冲口一晃而过的，或是添注涂改穷日累月的。”美辞说的持论者甚多，这与不少公众乃至多数修辞学者的潜意识中根深蒂固地存在着修辞是对语言的“美化”的观点有关。上世纪 缘年代前有王易、杨树达、金兆梓、陈介白、章衣萍等人，远年代有张弓、傅隶朴等人，苑年代后期以来有王力、黄庆萱、谭永祥等人。张弓的《现代汉语修辞学》的出版，标志着现代汉语白话修辞学发展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他认为：“修辞是为了有效地表达意旨，交流思想而适应现实语境，利用民族语言各要素以美化语言。”^①王力在给《修辞学习》^② 第 员期的题词中也曾经说过：“修辞是语言美的艺术”，黄庆萱在《修辞学》^③ 中说：“修辞学的使命在：‘美感’或‘欣赏’。……修辞学最大最重要的功用在于创造优美的言辞。”今天看来，“美辞说”的缺失很明显，因为“修辞”不仅仅要求“鲜明”“生动”，还少不了“明确”、“通顺”、“平匀”、“温密”，这种提法的出现与中国几千年来的文化传统和文人的生活方式密切相关，却意味着对更多修辞行为的忽视和误解，其理论的形成，不能不说是传统修辞理念影响的结果。摇摇这种修辞理念也影响到人们对修辞学研究对象的认识。

① 张弓《现代汉语修辞学》，天津人民出版社 员苑年。

② 黄庆萱《修辞学》，台湾三民书局 员苑年。

传统上基本上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派观点认为修辞学就是研究辞格,另一派的观点认为修辞学不只是研究辞格,而且应该研究各种修辞现象,即积极修辞与消极修辞两个方面,后一种观点后来为人们所广泛接受,并成为陈望道《修辞学发凡》的基本理论框架,积极修辞与消极修辞成为现代汉语修辞学的两大分野。然而关于积极修辞与消极修辞是否都是修辞学的研究对象的问题,自 20 年代后期以来却一直争论得很激烈,如吕叔湘在《漫谈语法研究》(《中国语文》1952 年第 1 期)、王希杰在《修辞的定义及其他》(《南京大学学报》1952 年第 1 期)、郑远汉在《现代汉语修辞知识》(湖北人民出版社 1952 年版)与《关于修辞学的对象和任务》(《华中师院学报》1954 年第 1 期)等论著中都明确反对以辞格为中心并赞成研究消极修辞,吴士文,自始至终主张大力研究消极修辞,李维琦也坚决主张研究消极修辞,他在《修辞学》一书中明确指出:“修辞学无论怎样变动,如果不将《修辞学发凡》已触及的问题深化,如果不将王易以来称为消极修辞的那一部分的研究加强,不把它的内容扩展,成为修辞学的主要部分,那就没有修辞学研究实质性的进步。”在《修辞学的反思和探索》(《湖南师大学报》1985 年第 1 期)一文中,他又进一步强调消极修辞研究的重要性,指出“积极修辞”并“不能在什么地方起多少积极作用”,而“被称为‘消极修辞’的那一部分修辞,也就是把文章(或话)写(或说)得明确通顺、平匀稳密,只要你开口说或动手写,这样的修辞就无所不在。它帮助你完成语言的交际任务,发挥语言最根本的功能,实在并不消极。”因此,“要把修辞学推向前进,关键在于研究‘消极修辞’,研究那些一开口说一动手写就会碰到的修辞现象,作出的成果必须对说和写(甚至在说写之前的思考中)有实